

“抗美援朝”时期丁玲研究

—以〈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与〈寄朝鲜人民军〉为中心—

金スノグ(金顺玉)*

目 录

- 一. 绪论
- 二. 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
- 三. “抗美援朝”时期的丁玲
- 四. 〈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与〈寄朝鲜人民军〉
- 五. 结语——写出新的爱国主义

丁玲固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颗巨星，从她所留下的丰功伟绩和涉及范围很广的影响力来说，以她的作品和作家生活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多得数不胜数，并且读者所立足的社会背景不断变迁而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开辟作家研究新局面的看法层出不穷，这既是应该的又是需要的。只是至于50年代初期猛烈轰动全中国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它在中国现代史上无疑也是不可忽视的一场具有政治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性的重要现象，但是注重于当时作家们的有关作品或有关活动的研究并不多，甚至对丁玲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更目前好像几乎没出过，至少管见所及从未见到。因此本文打算试着考察一下这时期她的有关“抗美援朝”活动，以便将丁玲她的复杂而多彩的作家面貌解释得更全面一些。

* 日本早稻田大学讲师, changshouming@hotmail.com

一. 绪论

1950年代,尤其是它前半期,于丁玲她漫长而坎坷不平的作家生活,可谓是最耀眼、最繁忙的时代。从新中国建国初期起到55年开始丁玲批判运动为止,这一时期作家的人生处于社会、政治上的峰巅状态。

首先,前几年丁玲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亲身投入实地工作,根据自己所得的经验和见闻来写出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8月初刊)。这本小说出版时既得到当时共产党领导们“文艺反映土改的第一部作品,内容符合党的政策”、“有教育意义,有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的认可¹⁾¹⁾,不仅次年作为“解放区历年来优秀作品”被编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²⁾,52年又拿到了前苏联斯大林文学奖。这对作家来说,的确是文学事业上的一大辉煌硕果。

追溯到抗战时期来说吧。丁玲36年到了延安以后,敢于把从前轰动文坛一时的以“莎菲”为象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面貌焕然一新,身穿军装,率团走动西北各地,不顾种种艰难生活,投身于抗日宣传工作。然后她也跟来自国统区的其他作家们一样,挨过几次整风和审干,这既为了跟随毛泽东所提倡的文艺讲话“工农兵”路线,或许更为了把前一段被国民党软禁时留下来的个人历史上的“污点”洗刷掉,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文学事业。反正,她经过这些在创作上以及思想上的严厉“考验”,把自己和自己手中的笔杆专心投入“改造”,才写出了这本长篇的。

其次,不管她后来的遭遇如何,在中国建国初期的文艺界当中,丁玲无疑是很有代表性的大红人。她既是在解放区为了抗战胜利奋斗回来的老革命,更是写作上已经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立过功绩的权威作家,她的声望无论在国内和国外都极高。当时中国新政权正值奠定国家基础之际,文艺界也正处于构建并强化共产党组织领导、思想管制的历史转变之中,忙于创办新体制。然而丁玲她那样上层领导他们能够认同“符合新时代”的文艺干部人才却不多,因此都纷纷要求她来负责筹备、运作各种文艺界新机关的

1) 1948年8月6日陈明致丁玲的书信。陈据萧三的话,述说艾思奇、萧三、江青三人看过长篇小说稿子后的意见。丁玲、陈明,《书信 丁玲陈明爱情书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132页。

2) 1949年5月新华书店出版,此时“编辑者认为书名过长,经丁玲同意”改为《桑干河上》。新华书店1950年重新排印,书名恢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编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参见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篇》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上卷第245页、下卷第846页。

行政工作。举例来说，她此时任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文代会”，下同）筹备委员、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常务委员兼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文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等重要职务。

不仅如此，她在当时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下，还经常被选为文艺界、妇女界的代表之一，担任了各种涉外性工作。那些年丁玲出国机会颇多。早在建国前一年就是1948年12月份，她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团员之一，初次出国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了世界民主妇女代表大会。之后，到1952年10月因腰痛宿疾加重而辞去所有行政工作为止，几乎每年都被派去前苏联以及几个东欧国家参加国际会议。与此同时，当外国人士来访中国的时候，组织上还常常安排让她去机场或车站参与迎送、陪宴席、主持会议等有关接待工作³⁾。

不亚于这些在国内外场面上的重要角色，更不可忽略的是，尽管身处如此繁忙、琐碎、负担又重的职务之中，除了自己的写作以外，丁玲抢着时间自己主动地去办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创办中央文学研究所（“文研所”）。关于丁玲参与创建文研所的具体经过，邢小群的研究⁴⁾比较详细。据邢小群的介绍，丁玲建国前已经怀有“为培养青年作家尽力”的心愿，于是自己向中央政府建议要办文研所⁵⁾。她不但尽力于筹办文研所的具体工作，而且亲自担任了第一任所长，为了培养出符合新政权所需的新作家勉力为之。

随着中央政府的思想管制愈加激烈，在文艺界里的政治运动也随之愈加频繁，逐渐导致作家难以主持，结果实际从事工作的时间不到3年就辞去了所长一职，而她要开一个正规学校扶植后生的夙愿因此半途而废。可是作为一个文学导师，丁玲对那批年轻一代作家们所产生的非常深远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后来丁玲批判开始了，在文研所里的一些经过竟然成了她的好几个“罪证”，有关学员和人员都由此被牵连了进去。再后来，甚至招来文研所的规模缩小、最后停办。不管结果的好和坏，作为这个建国后第一所开设的“文艺党校”的组建者之一，可见当时丁玲的“威风”多么大。

总之，在50年代初期中国，丁玲是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如上所述的这些事情件都可以说明，跟其他同时代的作家们相比，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新中国体制对丁玲的期望与

3) 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篇》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 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5) 同上，第一章第3页。

信任都要大得多。而她自己，也似乎为了能够成为真正一个党的“楷模”作家来报答这些政权方面对她的重用，无论她本人愿不愿意，都响应组织上的要求全力以赴，尽职尽责。

正值她这段顶峰时期，在中央政府号召下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热潮掀起了。自不待言，这就是跟中国出兵参与朝鲜战争并肩推广展开的全国性爱国教育宣传运动。

先该确认的是，“抗美援朝”这句口号后面本来还有另一句“保家卫国”的口号，两句是连接在一起的。进一步说，前句呼吁的中心目标即“抵抗美帝、援助朝鲜”，原来作为“保卫祖国（即刚成立的新中国体制）”爱国精神的具体表现所提出来的。如本文下述的那样，从当时中国国内外各种情况来想，这两句口号之间本应有相当的落差，但是中国政府按照当决定出兵朝鲜内战时面临的政治性需要，两者却巧妙地合二为一、相提并论一块儿来提倡的了。反正，从此可以推想而知，在当时中国如何投入这个“抗美援朝”运动，很可能立即意味着他/她的爱国精神多深乃至多差。这何况对应当拿起笔杆积极配合这种“国家大事”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更难免能成为一种思想表现上所苛求的指标。

“抗美援朝”运动一开始就把国内所有言论都卷入其间，包括文学、美术、报道等在内，凡是从事言论界的人员谁都不能跟不上它，丁玲自然也不例外。那么，当时丁玲为文艺界大有影响的负责人之一，如何响应、配合这个“国家大事”呢？本文将丁玲“抗美援朝”时期的一些有关活动及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几篇文章加以分析，并且拟于考察丁玲作品中所见的几个关于“爱国”主义思想问题。

二. 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

在此先概括来看，所谓“抗美援朝”运动是怎么开始的。

朝鲜战争（也可以称为“韩国战争”。因笔者不太习惯而暂且按照日语和汉语中通用的名称）始于1950年6月25日，战事一直进行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为止，血战了整整三年，这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也就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变。因为跟美国一样，中国也算是朝鲜战争中的另一个主角。自不待言，经历了三年的战火摧残，国土毁坏、国民伤亡最甚的则朝鲜半岛本身，但是在参加实际战场的总体兵力上来看，朝鲜战争却无疑是一场由美国与中国之间交战的“代理战争”。

据近年东亚历史研究所阐明的一系列成果来看，从朝鲜内战爆发到中国参战的具体经过大概如下：1945年8月朝鲜半岛因日本帝国主义败战而终于从长达36年的殖民地桎梏之下摆脱出来，然而由于当时东亚国际形势高度紧张并且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十分尖锐，又不幸地以三八线为界被分为南北方，两地不久各靠前苏联与美国的援助下分别建立了新国家。两个国家刚成立就为了凭武力达成统一各自着手扩充军备，两者之间军事紧张因此日益加剧，隔着三八线的小冲突日益频繁，以致两者处于“互相交战是不可避免”的危机状态。结果由朝鲜人民军开了火，之后朝方一举告捷，尽管美军迅速迎击，还把联合国各军也拉到美方来参战，朝军却仍然没有退却勉强维持阵地，于是战局陷入僵持。然而1950年9月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后，战争形势很快就逆转了。到了月末，美军终于越过三八线，同时还投入了大批空中力量，昼夜不停地进行轰炸，导致朝鲜战局危在旦夕。此时美国飞机已经在不断地“入侵中国领空”。这对于支持北朝鲜国家并且跟朝鲜处于友好关系的中国来说，意味着相当的“威胁”。

据说，中国政府是在朝鲜战争开火前后，早已就准备去参战的。但是真正面临这些国家“危机”，并接到金日成一次次愈来愈紧地向中国直接出兵援助朝鲜的请求，中央政府却感到了极大的困惑。那也许可谓有道理，因为新中国前一年成立伊始，漫长而艰难的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好不容易才结束，国内情况自然相当严峻。无论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急待解决的问题重重。况且军事方面，还没实现全国规模的“解放”，实在没有余力对付邻邦的火灾。再说，在这背后还有台湾问题，因此中国政府也不敢随便“挑衅”美国这个二战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

尽管如此，关于中国为什么付出巨大代价而出兵参战的这个问题，有许多研究者众说纷纭，在此勿庸赘述。结果是中国中央政府根据“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决不能置之不理”的共识⁶⁾，决定组成“人民志愿军”参战援助朝鲜。于是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到达朝鲜前线，之后，到停战为止都参加了2年9个月的战役。

在整个交战期间，在中央政府的不断号召下，全中国工作机关和生产单位推动各种捐献、节约、增产运动，以便筹措急剧增长的庞大军费。在此以前，中央政府也通过各级行政单位和所有舆论机关，包括文艺界、出版界在内，号召展开全国性思想教育宣传运动。这就是所谓“抗美援朝”运动。

6)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2000年版，军事科学出版社，第158页。

之所以中国政府号召推动“抗美援朝”，不外乎是因为要克服种种军事力量上的不利条件，动员全体人民举国一致地投身于参战朝鲜这个“国家大事”，首先必须控制住因参战而发生的民心不安和混乱。

早在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向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军区、各省市发出了《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以下为《指示》），指出：“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指示》规定宣传的基本内容为：“（一）我国对美军扩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二）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不待言，《指示》也要求“文艺界、出版界的配合”⁷⁾。

同日，还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席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并决定该会统一领导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3月中旬起，简称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各地行政区也先后成立了抗美援朝总分会。在这抗美援朝总会领导下，按照如上中共中央10月26日的指示，在全国开始展开以“仇视、鄙视、蔑视”（简称“三视”）为中心内容的宣传教育活动⁸⁾。就是“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敌人；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可以打败的⁹⁾”。

“抗美援朝”就这样开始：“在工厂、矿山、街道、农村、连队和学校等基层单位，利用墙报、黑板报、报告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进行了”宣传教育，并且“许多城市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集会，游行示威等”¹⁰⁾。

这些经过都可以说明，“抗美援朝”爱国宣传运动，开头就是几乎全面按照中央政府强大的指导以言论、思想教育为中心推广到人民生活的各种层面，尤其是如何呼吁“抗美

7)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2000年版，军事科学出版社，第187页。

8) 同上，第1卷，第187~188页。

9) 〈怎样认识美国—宣传提纲〉，原载《时事手册》，第二期（1950年11月5日）。摘自文汇报社会大学编辑室《社会大学时事学习资料（第一辑）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1950年11月17日六版，第97~108页（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收藏）。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2000年版，军事科学出版社，第188页。

10)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2000年第1版，军事科学出版社，第1卷，第188页。

援朝”的具体内容也差不多完全在于它的统管下。那么，处在这么个热潮当中，对于应当拿起笔杆积极配合的文艺工作者，响不响应根本不会成为作家个人能选择的问题，问题恐怕更在于如何响应政府指示来表现自己爱国思想有多深，进一步明确地说，对新中国政权他/她的忠诚多么坚定。可是实际要写，这既然有像“三视”那样的“框框”预先套在头上，作家能够创作上发挥自由构思的余地极其有限也是难免的。尽管在如此的情况下，许多作家竟然写出了成千上万的响应“抗美援朝”的文学作品¹¹⁾，而后来这些作品却被认为“千篇一律”，不过这或许是不得已的。因为它们与其说是为“抗美援朝”而写，不如说是为“保家卫国”来表示“自己多么忠诚于新中国体制”而写的。

不难想象，延安以后以忠诚于党的老革命作家为己任的丁玲，本应自愿参与“抗美援朝”运动的。下面来看，在如上情况下她身为新中国文艺界领导到底表现得如何积极。

三. “抗美援朝”时期的丁玲

从作家当时所处的情况设想，丁玲参加“抗美援朝”相当积极而比较领先也许是理所当然的。在此笼统地列举来看，她确实担任过一系列有关号召“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职务。

1950年3月，她早已被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前身）的宣传组成员¹²⁾。8月29日，当周恩来初次公开抗议美军入侵中国领空时，她就与茅盾、陈垣辅仁大学校长、马大迺北大工学院院长、白寿彝师大历史系教授等一起发表了署名文章〈拥护周外长对美国的抗议，向美帝国主义讨还血债〉¹³⁾。10月26日，上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成立了，她也任全国委员。11月12日，文艺界抗美援朝宣传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她又被推选为主任委员，接着16日，与茅盾等共145名作家联名发表了〈在京文学工作者宣言〉¹⁴⁾。此外，她跟其他文艺界领导

11) 据统计，中国作家的朝鲜战争文学题材的作品至少在3000种以上。杨义、常彬〈中国文学关于韩战叙事的政治与人性—20世纪中国作家的对韩认识与叙事变迁研究（二）〉《汉言言语文化研究》，第14辑，2007年版，第295页。

12)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篇》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页。

13) 原载《人民日报》1950年8月29日第4版。《丁玲全集》第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4页。

一样，还参加文艺界主持的一些游行、集会、捐款¹⁵⁾等各种示威活动。

虽然接受了如此之多的有关工作和任务，作家丁玲自己可称为直接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作品并不多。除了一些书评、序文以及有关创作问题评论和谈话以外，只有〈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寄朝鲜人民军〉两篇散文以及电影剧本〈战斗的人们〉而已。这些都是当1950年末“抗美援朝”运动刚开始时连续创作并发表的¹⁶⁾。从作家执笔的状况而言，这些与其说是能够多少反映出“抗美援朝”运动的实际情况，不如说是至少能表明一个当红作家响应当时政权要求而写的一种“口号”。

其中，关于〈战斗的人们〉，本来是丁玲应当时中央电影局局长袁牧之之约而写的，本该与其他几个作家所写的片段组合成一部影片，但这个计划没实现，电影也好像没拍成¹⁷⁾。令人感兴趣的是，这部影片原拟以当时避乱来到北京的朝鲜著名舞蹈家崔承喜为主角。她此时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里开设的舞蹈训练班授课。如下所述，这个剧本女主角不仅拟为世界闻名的朝鲜舞蹈家，里面舞蹈场面也相当多。据说还有个主意是

14)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篇》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271页。〈在京文学工作者宣言〉原载《文艺报》第3卷第3期，1950年11月25日出版。

15) 就她参加一次捐款活动的具体情况，当时《文艺报》上这么条信息介绍说：“在抗美援朝总会六月一日发布的三大号召下……各地纷纷展开轰轰烈烈的捐献运动，以实际行动加强支援朝鲜前线的中国志愿军弟兄们。……中央文学研究所最先热情澎湃地响应了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六月二日该所欢迎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归国大会上，作家丁玲、张天翼、周立波、康濯、马烽等当场捐献一千二百余万元和金戒指两枚，购买飞机；会上一致通过，建议全国文艺界踊跃捐献飞机大炮，争取最短期间内文艺界至少捐献飞机一架，并提议定名为『鲁迅号』”。参见〈文艺界在捐献运动中〉，《文艺报》第4卷第5期，1951年6月25日出版。还有一本有关资料明说作家个人捐款的具体金额：“1951年6月，丁玲参加文学研究所举行的欢迎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归国大会，听取慰问团代表赵国有、田间的报告。

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丁玲当场捐献稿费500万元（和新币500元——原注）”。参见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篇》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页。

16) 〈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原载《文艺报》第3卷第4期，1950年12月10日出版，〈寄朝鲜人民军〉原载《文艺报》第3卷第6期，1951年1月10日出版。〈战斗的人们〉原载《人民文学》第3卷第4期，1951年2月1日出版。

17) 关于这个剧本来历，丁玲这么回想说：“抗美援朝时期，中央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同志计划约请文艺界的一些同志，各写一段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短的电影片段，组合成为一部影片。我（即丁玲—笔者注）遵命践约写了《战斗的人们》。但后来，这个计划没有实现，我也忘记了这篇。”〈我与戏剧（代序）〉第6页，原载《丁玲戏剧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出版。《丁玲全集》第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

要崔承喜把全剧改为舞剧¹⁸)。丁玲也很可能当时在北京,或者此前出国参加国际会议时看过她的演出¹⁹)。这些事情好像都值得专门研究,本文由于资料既不够力量也不足,因此待考。

坦率地说,这个短片剧本不过是一个片段,要看作一个完整的作品来评论恐怕有点难,因此本文只简单地说明一下,主要打算就前两篇散文加以论述。这两篇虽然分量都有限,但可以认为是能够充分地阐明丁玲在自己写作上如何要配合中国政府《指示》来表示她的“爱国”思想。

四. 〈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与〈寄朝鲜人民军〉

〈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后改题为〈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下简称〈寄志愿军〉)和〈寄朝鲜人民军〉(以下简称〈寄人民军〉),从题目乍一看,两篇都似乎书信方式来单纯地表达作家对在朝鲜前线战士们的极口称赞和满腔热忱。然而,如注意到其实这些都主要面向国内读者所执笔的这一点,这两篇却很能表示进一步错综复杂的意思;就是说,本文实际上可以读为借献给战士们的赞歌来揭示:读者“应该如何看待参加抗美援朝的战士们”。然而,尽管两篇本来出于如此同一动机所著,但两者内容却大不相同。

〈寄志愿军〉一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以自问自答地,一段一段地讲述中国人

18) 据1951年1月15日致陈明的书信:“前天波儿^②(原注-下同)来找我,决定由她导演,洗群^③副导演,波儿的意思想把全剧^④都改为舞剧,就是舞加多,这样可以减少战地的外景。但这需要崔承喜^⑤的创造。我没有意见,由她们搞去吧。明天去找崔谈。看看如何?剧本已交《人民文学》了,因波儿说其他稿子都不太好。(后文原略-笔者注)”。

下注:“^②指陈波儿,当时是电影局艺术处处长,艺委会主任。^③洗群,早期的电影工作者,当时是专职的电影导演。^④指电影剧本《战斗的人们》,是丁玲应袁牧之之约而写的。

^⑤崔承喜 朝鲜著名舞蹈家,当时在北京授课,拟做影片的一个重要角色。”《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101页。

19) 据金赞汀,1948年12月崔代表北朝鲜,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世界民主妇女代表大会,如上所说这时丁玲也参加该会。1949年12月崔也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并演出,丁玲也作为主席团成员参加该会。参见金赞汀,《炎は闇の彼方に-伝説の舞姫崔承喜》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2年版,第250~251页。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篇》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235页、第261页。

民志愿军的“来历”。而这些都把中国抗战、土地改革、建国事业、国共内战等“伟大的历史”直接地跟“抗美援朝”连接在一起。如下：

你们从哪里来？从毛泽东的中国来，从马达旁边，脱下了油污的工衣，穿上出征的战袍，你们在工厂里，是劳动模范，你们曾经为祖国的工业建设创下劳动新纪录。但当你们听见美帝国主义把大炮伸向鸭绿江边，你们就立刻用拿钳子的手扛上正义的枪，为保卫祖国，为保卫祖国的工业建设，而走向朝鲜了！

你们是种地的农民，你们曾参加过伟大的土地改革，和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斗争，消灭了亘古以来的封建剥削制度。……如今，你们听到朝鲜人民，又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凌，……你们不能忍受，你们擦去了手上的泥土，在志愿书上签了名，别了你耕耘的土地，去为了兄弟的民族，受难的朝鲜的人民。

……你们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你们走过雪山，走过草地，从江西走到了陕北根据地。你们抗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直到日本投降。你们原想放下枪，原应放下枪，回到故乡……可是美帝国主义支持了蒋介石匪帮，你脱不下军装，放不下枪，为了人民的解放，你又上了战场。……直把美蒋追下了海，他们苟延残喘，盘踞在台湾小岛上。……可是你一听到美国又伴同朝鲜的李承晚，把朝鲜折腾得更不像样子，你想起和你并肩作战过的兄弟——朝鲜人民为了中国的解放，和你一道啃过雪，一道浮游长江，一道爬过高山，一道缴获大炮、坦克、机枪，你不能让他独自回国，你要和他一道，把麦克阿瑟赶跑。你又举起你神圣的枪发誓了，你要求去参加了志愿部队，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共患难、同命运的兄弟，你又度过了鸭绿江。²⁰⁾

不难看出，这段措辞几乎完全符合中央政府所提倡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就是“为保卫祖国而去朝鲜与美帝战斗”的当时政权所需的特殊逻辑。这从写就此篇文章时本来的动机来看，可以称为是个政治表现上的一个成就吧。问题是，文章由于按照这个逻辑为出发点，里面的“朝鲜（人）”好像差不多变成为了突出“志愿军如何英勇、忘我、勤奋、耐心、热情……乃至如何伟大”而摆下来的一种“点缀”。虽然文中也写到几句抗战时期“战友”朝鲜人的事迹，但是这些都不过是归于肯定和赞扬“将伟大的中国革命扩大到朝鲜”，以使读者能接受这个逻辑的修辞罢了，未超越点缀的范围多少。

20) 丁玲，〈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支援部队〉，原载《文艺报》第3卷第4期，1950年12月版，第3页。

说白了，该文中的朝鲜人差不多都被写成悲惨、可怜并且盼望被人、应该被人救援的“受害者”。如：“你们（指志愿军——笔者注）渡过了炮轰过的鸭绿江，你们到了被炸毁的朝鲜城市和乡村，房屋全塌了，一片瓦砾，你们看见了朝鲜人民，他们没有了家，他们什么也被美帝国主义的烧夷弹烧了，他们还穿着单衣，但是他们招待了你们，把痛苦向你们倾诉，他们要同你们一道把美帝侵占了侮辱了的土地收回²¹⁾”。

接着，文章恐怕照样根据政府〈指示〉所提倡的“三视”吧，咒骂美帝，如：美帝他们是“虾兵蟹将，不敢打硬仗，他们害怕”志愿军“只好用无数飞机”啦、志愿军“一到朝鲜，就把他们吃了一片，云山一仗，消灭了美李匪军一万多”啦、“美国人的腿虽然长，却只能跪下来投降²²⁾”啦、还有“麦克阿瑟像一条疯狗²³⁾”等等。这些谩骂，即使连同如下“中国人民是无敌的”，麦克阿瑟“太瞧不起中国人了”等几句，以供刺激读者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并促使读者敢于克服面对美国这个二战后最强大且军备最先进的国家时难免感到的恐惧。但是它同时令人怀疑：透过文字是不是看得见多少另外的语气——无意间“轻视”朝鲜人这个战争本来主角的意思呢？读者当接受这些“三视”时会不会这么问：既然美帝那么软弱可欺，为什么朝鲜人自己打不败他们？是不是因为他们比美帝还弱？

应该事先阐明，本文不是说作家本人思想上会有歧视朝鲜人的意思，而是说“抗美援朝”逻辑本身恐怕就有这么个破绽。也许由于丁玲紧跟着《指示》写了这两篇散文，因而把它反映得比较清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寄人民军〉里面本应有的“伟大的朝鲜历史”却不多见，它主要述说的更是悲惨、痛苦、应该被人救援的可怜的对象。如下：

……你们好像是少数，好像是劣势，但你们是多数，多到不知比美国的侵略军

多许多倍，你们是优势，……这因为全世界爱和平的人民支持着你们，毛泽东支持着你们，斯大林支持着你们。

你们年青，但你们却都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你们国家的区域虽小，历史上所受的苦难却非常深重久长。因此你们以及朝鲜的所有人民谁也懂得在

21) 同上。

22) 丁玲，〈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支援部队〉，原载《文艺报》第3卷第4期，1950年12月版，第4页。

23) 同上。

帝国主义蹂躏下的非人生活的痛苦，朝鲜曾经许多年沦为附庸国，一个没有独立权的国家，但朝鲜人民反抗强暴的心，从来也没有被征服过。朝鲜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对异民族奴役压迫的历史，也是一部英雄人民的历史。你们是在这样的历史下生长长大的，你们承继了革命历史的传统。

你们曾经胜利过，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北朝鲜在苏联的帮助下得到了独立解放。一九四六年成立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民主政权。人民有了自己政权，什么都好了，农民分得土地，工业得到发展，文化提高了，……你们怎能忍受把光明再变成黑暗，把美丽变成肮脏？！你们不能看着一个漂亮的健康的婴儿活活被人掐死。你们不能让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再沦为奴隶。²⁴⁾

虽然这里也有“胜利”“英雄人民”“革命历史”等字句，但这些总归于“毛泽东”“斯大林”“苏联”等朝鲜邻邦“伟大的领导”，就是提到朝鲜人也至多“金日成”一个名字而已，却它没有〈志愿军〉里所写的“英雄”那么丰富多样。如读者注意到该文述说的多半是“全世界”如何支持北朝鲜，它不料反而暴露出朝鲜竟然“伟大的英雄”少得可怜，简直是寥寥无几，无依无靠。然后这篇里的“三视”以至于有点显得失衡，不能不说写得差不多失败：美帝既然是“纸老虎”，怎能“把朝鲜作为祭羊”²⁵⁾呢？

同样的问题也能见〈战斗的人们〉这个片段。这篇主要描写的是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后，进攻到三八线以南的一个朝鲜人民军文艺工作团。他们跟着部队突破敌人的包围，往北退却回到北朝鲜，最后跟“抗美援朝”来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会师，大家为了中朝人民的共同胜利齐呼“万岁”而结束。

就在这么一个简直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那样的剧情上，为工作团队长舞蹈家女主角可谓象征着“战斗的朝鲜人”，而“她”在剧里除了舞蹈场面以外，多半部分都是或哭泣或悲叹，身体又不是受伤就是挨饿，甚至脱离了危险“颓然晕去”²⁶⁾，大体上被写为软弱无力的可怜样儿。只有一个战斗场面里女主角竟然从敌人阵营里夺下枪支，可这段情节写得既简短又粗率，就作品总体来看，读者未免感到多少突然之嫌。总之，这里的朝鲜人形象照样被写为又无力又可怜并且中国人应该帮助和救援的对象。

这个短片原拟以崔承喜为主角，而作者丁玲对让她把全剧改写为舞剧的提议却“没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上所述，剧本只不过是粗略地照抄“抗美援朝”逻辑而已，

24) 丁玲，〈寄朝鲜人民军〉，原载《文艺报》第3卷第6期，1951年1月10日版，第3页。

25) 同上。

26) 丁玲，〈战斗的人们〉，原载《人民文学》第3卷第4期，1951年2月，第21页。

它作为能够吸引观众的一部宣传教育影片该有的、多少能说明朝鲜和朝鲜人的积极作用，恐怕只限于舞蹈场面，作家也大概自己了解可观的地方全靠崔的演出，从此可见。

五. 结语——写出新的爱国主义

对成立伊始的中国新政权而言，朝鲜内战爆发乃至美军介入是关系到生死存亡、前所未有的大事变。但是要实际越境出兵到朝鲜这个外国参战，除了克服种种国内外负面条件以外，意识形态上还有相当大的障碍必须事先超越。换言之，要“渡过鸭绿江”预先要越过“国家危机”与“出兵外国”之间的差距。“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里面的逻辑，可谓是以意识形态上的这次飞跃为目的的一种创造。

然而逻辑归逻辑，在疲惫于长期战乱的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真实感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两个口号之间未免有更大的根本性落差。要让他们真正能够接受这个逻辑而全心全意投入“抗美援朝”，恐怕还需要解决人民心态上的这种问题。这就是当时新政权号召全国展开教育宣传运动并要求言论界响应和配合的动机吧。

应该确认，这些涉及到人民生活全范围的思想教育运动，在中国新政权逐步建构限制国内舆论机制的历史转变过程中，起到了相当于先河、开端的作用。文艺界理所当然地卷入在其中。如本文所述，之所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大批文学作品多半显得“千篇一律”，那正是因为它们原先有“三视”那样严重的准则。进一步明确的说，对作家写作上如何描述“抗美援朝”，都原有组织领导和管制的。

再说丁玲〈寄志愿军〉〈寄人民军〉两篇作品。这些既是响应政权方面的号召而写的，就能说是作家丁玲为了消除和缩小两句口号之间的落差而写出的新的“爱国主义”尝试，作品里面“英雄”形象也可以认为都是为读者在“抗美援朝”当中应该如何表现自己“爱国”思想提供了一个“榜样”。它们似乎能够说明，当时丁玲作为一个党员作家多么忠实于新政权的需求，她政治上的表现也相应的。但是，如果再一次着眼当时她在文艺界中所占的特殊位置来想，两篇作品会更具有深重的意味。

秦林芳就建国初期丁玲对文学新体制，引着作家自己当时“我愿在党的指引下，做好一名小号兵”的决心话概括来说：“她不但迅速融入其（文学新体制）中，成为新体制依靠

的中坚力量，并且为它的确立摇旗呐喊，充分发挥了‘一名小号兵’的作用”²⁷⁾。秦还以50年代初震动一时文艺界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对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为例指出，当时丁玲主编《文艺报》担当起了文艺界“思想领导”的任务：

虽然《文艺报》名义上隶属全国文联，1957年后委托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实际上，在较长时间内，领导它的始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丁玲任主编期间，《文艺报》除发表少量文艺消息和文学作品外，主要刊发理论文字和评论文章。《文艺报》主编的特殊身份，也为丁玲“做好一名小号兵”的主观愿望，提供了实现的条件和施展的舞台”²⁸⁾。

《寄志愿军》《寄人民军》不是理论乃至评论文章，但就它们主题和执笔的动机来看，却是十分带有政治性的文章。而两篇都刊登在当时“担当起思想领导”的《文艺报》上，于是不难想象，它们对于以全国文艺干部为中心的读者来说，不止是“榜样”，更会是相当具有威信的一种“标准”。丁玲两篇作品所写出的“爱国”主义，不管其内容如何，在当时还是很可能有相当的影响力。

虽然如此，她以后不再以“抗美援朝”为主题写作品了。这也许是由于和亲自赴朝写出报告的作家们不一样，她自己没到过朝鲜前线的缘故吧。对于丁玲她这样经过如抗战和土改等实地经验来“改造”自己写作的作家来说，在繁忙的职务上挤出时间，只靠着“口号”应时赶写，恐怕实在是难以做到的。她写的两篇以及《战斗的人们》里面朝鲜人形象太乏味，除了她“抗美援朝”逻辑跟得太紧以外，可能还有这种原因²⁹⁾。

27) 秦林芳，《丁玲的最后3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8页。

28) 同上，第43页。

29) 正确地说，她确实到过朝鲜。据资料，她1948年初次出国去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世界民主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路过朝鲜一次：“(1948年12月—笔者注)17日…从大连乘轮船至朝鲜，换乘火车，过新义州、丹东，去哈尔滨。27日，坐火车经朝鲜新义州。31日晚，抵哈尔滨。”参见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篇》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虽然是短暂的停留，朝鲜风景给她的印象却好像很深，丁玲当时日记里有这么不短的一段述说：“七月二十六日 过新义州坐火车，两旁山水很像中国的南方，有片的稻田，有低低的小山，或远或近。山上全长满树，有小槐树，有柏树，线条很温柔。有隐在树后的小屋，至露出屋脊，象画上的屋。有时也看见窗户，小的，都嵌有玻璃。也有茅屋，就更低了。孩子们站在路旁看火车过去。年轻的姑娘也背一个小孩在腰上。女人都穿着极短的上衣和极长的裙，头上顶着一个大包或一个筐子走过去。男人穿着衬衫，没有赤膊的，老头子还带着古式的黑纱帽。我们坐的是公务员的车，全是公务员，一个年轻的媳妇，应该是闺女的年龄，却已经跟随着她的丈夫（看样子是丈夫—原注）走上车来了。年轻

以后她却在一些书评、序文以及有关创作问题评论上几次说到“抗美援朝”，尤其是在她此时所提的“生活和创作”问题上来看，对一系列她的评论专门考察是值得的。但是本文由于篇幅有限且不多谈，有待今后研究考证。

参考书目

(中文)

- (无记名) 〈怎样认识美国—宣传提纲〉，原载《时事手册》，第2期（1950年11月5日）。摘自文汇报社会大学编辑室《社会大学时事学习资料（第1辑）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1950年11月17日6版，（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收藏）。
- 茅盾、丁玲等，〈在京文学工作者宣言〉，《文艺报》第3卷第3期，1950年11月25日出版。
- 丁玲，〈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文艺报》第3卷第4期，1950年12月10日出版。
- 丁玲，〈寄朝鲜人民军〉，《文艺报》第3卷第6期，1951年1月10日出版。
- 丁玲，〈战斗的人们〉，《人民文学》第3卷第4期，1951年2月1日出版。
- (无记名) 记者〈文艺界在捐献运动中〉，《文艺报》第4卷第5期，1951年6月25日出版。
- 丁玲，〈我与戏剧（代序）〉，《丁玲戏剧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出版。
- 《丁玲全集》全1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 秦林芳，《丁玲的最后3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的脸上薄薄搽了一点胭脂，穿着白沙短衫，花的红裙子。她是我看见的惟一系奶罩的女人。她胆子很小，也不敢着位置，站着不动。后来有个年轻男人让她坐，她就看也不敢看人一眼就坐下去了。”可见，她以作家的眼光观察得那么详细、尖锐。本文没能做详细的评述，这些很可能以供于〈战斗的人们〉描写朝鲜风景的基础。参见《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9~350页。

- 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篇》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2、3卷，2000年版，军事科学出版社。
- 丁玲、陈明，《书语 丁玲陈明爱情书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 杨义、常彬，〈中国文学关于韩战叙事的政治与人性—20世纪中国作家的对韩认识与叙事变迁研究（二）〉，《汉中文言文化研究》，第14辑，2007年版，第293~314页。
- 商金林，〈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评路翎的“志愿军题材”小说〉，《汉中文言文化研究》，第12辑，2007年版，第345~361页。
- 道上知弘，〈中国“抗美援朝文学”里的朝鲜人形象——以巍巍《东方》为例〉，2006年7月15日，《东京—首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话会》资料（日文）
- 天児慧·石原享一·朱建荣·辻康吾·菱田雅晴·村田雄二郎，『岩波現代中国事典』，岩波書店，1999年版。
- 萩原遼，『朝鮮戦争—金日成とマッカーサーの陰謀—』，文芸春秋，1993年初版，1997年，文春文庫。
- 葉雨蒙著，山崎一子、朱建荣訳，『黒雪—中国の朝鮮戦争参戦秘史』，同文館，1990年版。（原著：叶雨蒙，〈出兵朝鮮 抗美援朝历史纪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 金賛汀，『炎は闇の彼方に—伝説の舞姫崔承喜』，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2年版。
- 朱建荣，『毛沢東の朝鮮戦争 中国が鴨緑江を渡るまで』，岩波書店，2004年版。
- 和田春樹，『朝鮮戦争全史』，岩波書店，2006年版。

（韓文）

- 趙大浩，「楊朔의 韓國戰参戦文學研究—〈三千里江山〉을 중심으로—」，이기윤、신영덕、임도한，『한국전쟁과세계문학』，국가자료원，2003年版。

<Abstract>

Study of Ding Ling on ‘Kang-Mei-Yuan-Chao(抗美援朝)’period
— Mainly about ‘to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 Corps in Korea’ and ‘to Korean People’s Army’

Kim, Sun-ok

This article analyzes activity and a work of writer Ding Ling in the nationalism education advertising movemen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ed during China participation in Korea War. Her then work was a trial to describe new nationalism in according to a slogan “Kang-Mei-Yuan-Chao(抗美援朝) —for mother country defense, resist American imperialism and assist Korea” of the government.

Key words : Chinese literature, Ding Ling, ‘to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 Corps in Korea’, ‘to Korean People’s Army’, ‘Kang-Mei-Yuan-Chao’, nationalism

투 고 일 : 2008년 7월 15일 / 게재확정일 : 2008년 8월 15일